·社会学研究·
DOI:10. 20004/j. cnki. ujn. 2026. 03. 011

学区房、教育期望与家长教育焦虑

——基于我国七个特大城市数据的分析

刘　琳　张文宏

[摘　要]随着“双减”政策的逐步推进,“学区房”开始降温,但家长的教育焦虑依然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基于2023年我国七个特大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因果中介分析方法,探讨家长购买学区房、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购买学区房和高等教育期望都是导致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期望在购买学区房与家长教育焦虑之间既发挥中介效应,又存在交互效应。一方面,购买学区房会提高家长具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高等教育期望又会进一步增加家长的教育焦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期望加剧了购买学区房家长的教育焦虑,仅当家长没有高等教育期望时,购买学区房才能够缓解其教育焦虑。因此,引导家长对学区房效应形成正确认识,减少期望偏差是缓解教育焦虑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学区房;教育焦虑;高等教育期望;中介效应;调节效应

早期的教育焦虑研究聚焦于学生群体,随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与“双减”政策的出台,教育焦虑的研究主体延伸至家长[①]。“双减”政策在执行初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②],但家长对于升学的焦虑以及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并未改变,一些家长甚至可能会因为担心孩子在学业压力减轻后失去竞争力而感到更加焦虑[③]。《家庭教育蓝皮书2024:中国家庭养育环境报告》指出,80%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表现感到焦虑[④]。“鸡娃”是“中国式教育”的代名词,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家长的真实心态写照[⑤]。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不仅关系到家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流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4&ZD15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阶层再生产的空间资本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CSH012)。

[作者简介]刘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箱:linliu@tjnu. edu. cn;张文宏,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丁亚东,孟敬尧,马鹏跃:《“双减”政策能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吗》,《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22期。

②孙卉,傅宏:《新闻报道对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双减”政策的缓冲作用》,《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③She B. , Ramasamy S. S. , Loahavilai P. ,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es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Vol. 12, No. 1, 2023, pp. 1-11.

④马国川,张蓝心:《家庭教育蓝皮书2024:中国家庭养育环境报告》,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24年版,第20-24页。

⑤耿羽:《莫比乌斯环:“鸡娃群”与教育焦虑》,《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1期;杨发祥,闵兢:《“鸡娃”的生成:现实图谱、制度型塑与文化建构》,《学术论坛》,2022年第3期。

群体的心理健康，通过教养方式和代际传递，也会影响到家庭教育、子女身心健康等重大问题[①]。“学区房”是“双减”政策实施前家长的主要焦虑源之一，《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为学区房而焦虑的家长人数过半[②]。那么，在“双减”政策实施后，购买学区房会缓解还是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呢？哪些因素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呢？这是本文要回应的核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学区房购买与家长的教育焦虑

尽管教育部门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并且通过“免试就近入学”政策来缓解教育竞争，但却演变成了一场将家庭裹挟其中的“军备竞赛”[③]。就近入学制度本质上是以居住地为标准分配教育资源，人们可以通过购买优质学区住房的途径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基础教育资源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化”到了房价中[④]，购买学区房成为入读优质公办学校的合法途径。学区房附加优质文化资本符号、经济资本符号以及社会符号内涵，家长购买学区房可以将自身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成子女的学业成就[⑤]。学区房消费能够确认中产身份，维持或晋升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反映出了新生代家长们的地位焦虑情绪[⑥]。

“双减”政策实施后，多校划片、大学区、共享学区等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优质教育资源与“天价”房源的一对一捆绑关系彻底解除，有效消除了高质量办学与高房价的强相关性，家长的择校焦虑得到有效缓解[⑦]。但是，部分学者指出“多校划片入学”“公民同招”等供给侧内部结构再调整只是增加了择校的不确定性，使得家长的焦虑进一步升级与蔓延[⑧]。可见，学区房问题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是否在“双减”政策实施后降低仍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受数据限制，本文无法测算政策实施前后家长教育焦虑的变化，但能够检验购买学区房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在政策实施后是否依然存在。因此，本研究假设在政策实施初期，学区房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依然存在，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购买学区房能够显著地增加家长的教育焦虑。

---

①Friedman H. P., Bilsky S. A., Luber M. J., Parent Anxiety, Child Anxiety, Parental beliefs about anxiety,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examining direct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Vol. 32, 2023, pp. 3419-3429.

②智课教育家长成长研究院：《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https://f.sinaimg.cn/edu/bc205105/20180921/jlreport.pdf，2026.04.30.

③吴愈晓：《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④冯皓，陆铭：《通过买房而择校：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世界经济》，2010年第12期；郑磊，王思檬：《学校选择、教育服务资本化与居住区分割——对“就近入学”政策的一种反思》，《教育与经济》，2014年第6期。

⑤吴愈晓，黄超，黄苏雯：《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3期；文军，李珊珊：《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上海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⑥刘硕，周可阳：《学区房消费与新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基于绍兴市新中产阶层的访谈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4期；聂晨：《“学区房热”探析——文化资本视角下对学区房购买动机的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李佳莹，孙凤：《学区房符号消费与新生代家长的地位焦虑》，《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9期。

⑦Qian M., Xiao W., Wei Y., The formation logic and counteractions of par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accompanying the introduction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Vol. 13, No. 4, 2023, pp. 181-192.

⑧陈友华，苗国：《升学锦标赛、教育内卷化与学区分层》，《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二)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

教育期望是研究教育焦虑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威斯康星学派最早提出将"教育期望"纳入家庭背景对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①]。教育期望是指家长对孩子学业成绩的现实预测,如课程成绩、技能发展和达到的最高教育水平,大多数研究将教育期望简化为家长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②]。教育期望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既与家长的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等客观因素有关,也同家长本身对教育的价值观念和教育成就动机等主观因素相关[③]。一般来说,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越会意识到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就越高[④]。有学者认为,家长的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成正比,即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容易产生教育焦虑[⑤]。很多家长的教育期望目标是考取"211""985"类的重点大学[⑥],这与现实重点大学录取率相去甚远,当家长感知到现实与期望差距较大时,教育焦虑便会产生,在"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下,错位的教育期望依然是影响教育焦虑的重要因素[⑦]。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家长的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学区房、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

无论是购买天价学区房,还是期待孩子前程似锦,家长们都希望借助教育途径实现阶层的维持或向上流动,这成为多数家庭教育焦虑的重要原因[⑧]。除了优势教育资源以外,学区房也是家长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邻里效应实际上是家长动机或期望的作用,可能会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⑨]。优质邻里构成和社区环境对于家长教育期望具有正向影响,购买学区房意味着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势的邻里效应,可能会提高家长的教育期望,进而增加他们的教育焦虑。可见,教育期望可能在购买学区房与家长的教育焦虑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然而,作为"重要他人的鼓励"[⑩],家长的教育期望过高反而不利于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当家长的教育期望过高时,可能会加剧因购买学区房而引发的教育焦虑,可见,家长的教育期望可能会对购买学区房家长的教育焦虑发挥调节效应。由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购买学区房能够显著地提高家长的教育期望,进而增加家长的教育焦虑(中介效应);家长的教育期望可能会调节购买学区房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调节效应)。

---

①Sewell W. H., Shah V. P., Parent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No. 2, 1968, pp. 191-209.

②Yamamoto Y., Holloway S. D.,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ociocultural contex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2, 2010, pp. 189-214.

③徐水晶,周东洋:《教育作为阶层代际传递的中介作用研究》,《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④Liu J., Peng P., and Luo L., The Relation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32, No. 1, 2020, pp. 49-76.

⑤Yu S., Zheng J., Xu Z., et 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s'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invol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ducation anxiety and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equ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13, No. 800039, 2022, pp. 1-11.

⑥余秀兰:《父母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及其教育期望》,《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周广肃,夏宇锋:《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经济科学》,2021年第6期。

⑦Chen G., Oubibi M., Liang A., et al., Par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based on the family and students' personal factors,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Vol. 15, 2022, pp. 2067-2082.

⑧姚从容,马玲:《教育内卷、摇号入学与减负新政中的焦虑传递》,《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⑨Owens A.,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as competing and reinforcing contexts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83, No. 4, 2010, pp. 287-311.

⑩Sewell W. H., Shah V. P., Parent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No. 2, 1968, pp. 191-209.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策划实施的“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项目，使用了2023年第一批调查的七个城市的数据结果，即沈阳市、济南市、西安市、青岛市、郑州市、南京市和东莞市。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PPS抽样法，在每个城市抽取25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2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运用Kish抽样法随机抽取1名年龄在16—69周岁的受访者，最终获得3428份样本。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出有子女的样本（2481份），剔除相关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框架的有效样本为2254个。

（二）变量的操作化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家长的教育焦虑，测量题项为“比起社会上的其他父母，我对孩子的教育”感受，1—5分代表“完全不焦虑”“不太焦虑”“一般”“比较焦虑”“非常焦虑”，分数越高，家长的教育焦虑越强。在本次调查的七个特大城市中，家长的教育焦虑均值为2.85分（S. D. =1.03），超过了中间水平，说明家长的教育焦虑整体偏高。

核心自变量为购买学区房的行为，通过“为了让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您家是否做过或可能会做‘购置学区房’这件事情？”进行了测量，将“曾经做过”作为“购买学区房”（17.75%）的测量，将“可能会做”（30.25%）和“不打算这样做”（52.00%）合并为“没买过”（82.25%）。

本研究通过“您家的孩子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达到的教育程度底线是？”来测量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购买学区房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之间难以界定因果关系，本文主要考虑到购买学区房是一个过去已经发生的行为，而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可能会随着购买学区房而产生变化。对于曾经购买过学区房的家长而言，调查获取的数据为购买学区房后的教育期望，因此根据时间顺序的先后，将购买学区房作为核心自变量，将家长教育期望作为可能的中介变量。但是，由于教育期望测量的是“底线”，也存在着家长的教育期望并未由于购买学区房而发生变化的可能，且有可能会调节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因此，本文也将教育期望视为调节变量。

已有研究指出，我国的家长普遍表现出对子女考取重点大学的高期望，且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七个特大城市中，67.82%的家长希望自己的

表1　家长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教育期望的交互分析（%）

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长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职业高中/中专/技校	普通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N
初中及以下	5.10	4.70	13.29	16.24	55.30	5.37	745
职业高中/中专/技校	2.05	0.00	7.18	9.23	76.92	4.62	195
普通高中	1.62	3.23	10.24	11.86	64.69	8.36	371
大学专科	0.47	1.64	2.82	7.51	77.00	10.56	426
大学本科	0.70	0.35	2.29	4.75	75.53	16.37	568
研究生及以上	0.00	0.88	2.65	0.88	71.68	23.89	113
合计	2.23	2.36	7.40	10.05	67.82	10.13	2 418

孩子至少要获得“大学本科”学历,10.13%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要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即使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有超过半数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参见表1)。考虑到家长对于高等教育期望的集中性,在后续建模中,对家长的教育期望测量使用了“高等教育期望”的变量,将“初中及以下”“中专/职高/技校”“普通高中”“大学专科”合并为“无高等教育期望”(21.69%),将“大学本科”“211/重点本科”“985/名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合并为“有高等教育期望”(78.31%)。

控制变量除了城市、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户籍登记地、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职业类别、家庭年收入[①],还包括了以往文献中较为关注的子女成绩和教育参与变量。子女成绩通过“您最大的孩子的整体成绩在班里处于?”题项进行测量,分为“下游”“中下游”“中游”“中上游”“上游”五个等级,记为1-5分,分数越高,代表子女的成绩水平越高,均值为3.42分(S.D.=0.78)。除家长的教育期望外,已有研究发现家长积极参与子女学习与子女成绩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监督型参与存在消极影响[②],可能成为教育焦虑的来源。子女教育参与通过“您平时参与孩子教育学习的频率是?”进行测量,频率由低到高分为“从不”“每年1-2次或更少”“每学期1-2次”“每月1-2次”“每周1-2次”“每天”六个等级。对六个题项进行了主成分分析,“与孩子的校内老师交流学业情况”(0.9326)“与孩子同学或朋友的家长交流孩子学业等情况”(0.9190)“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0.9215)“辅导孩子家庭作业”(0.9098)“与孩子交流学业和生活”(0.9242)“陪伴孩子参加课外活动”(0.9154),所有指标的方差贡献率为84.72%,指标的因子负载都超过0.9,KMO检验值为0.9268,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了17677.831($P<0.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主成分分析。为了便于理解和计算,将生成的因子转化为1-100的标准分,子女教育参与度因子的均值为40.88分(S.D.=31.39)。

(三)模型的选择:因果中介分析(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根据本文的假设3,高等教育期望可能在购买学区房与家长教育焦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要通过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期望发挥作用。但同时,高等教育期望也可能对因购买学区房导致的家长教育焦虑产生调节作用,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期望可能调节购买学区房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方向。依据上述假设,绘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图,请参见图1。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本文选取因果中介分析模型来进行验证。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将高等教育期望作为调节变量,但调节效应和交互效应在统计模型上没有本质区别,在统计模型中都是通过交互项来进行检验。传统的中介效应方法没有考虑到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交互作用,如果交互效应真实存在并且被忽略,那么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将出现偏差,这些局限可以通过中

①城市:东莞市占15.13%,南京市占11.67%,沈阳市占12.25%,济南市占16.06%,西安市占15.66%,郑州市占14.15%,青岛市占15.08%;性别:女性占56.17%,男性占43.83%;年龄的均值为44.55岁,标准差为9.17岁,最小值为21岁,最大值为67岁;户口类型:51.29%为农业户口,48.71%为非农户口;户籍登记地:外地户籍占11.18%,本地户籍占88.82%;婚姻状况:无配偶占5.28%,有配偶占94.72%;子女数量的均值为1.51个,标准差为0.62个,最小值为1个,最大值为4个;政治面貌:82.65%为非党员,17.35%为党员;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占30.83%,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占23.34%,大学专科占17.66%,大学本科及以上占28.17%;单位性质:体制外占69.74%,体制内占30.26%;职业类别:产业工人占14.73%,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占5.54%,服务业人员占39.84%,办事人员占7.01%,专业技术人员占25.69%,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2.84%,无业、不便分类及其他占4.35%;家庭年收入的均值为204 451.30元,标准差为923561.40元,最小值为0元,最大值为40100000元。

②Hattie J., *Visible learning: A synthesis of over 800 meta-analyses relating to achiev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6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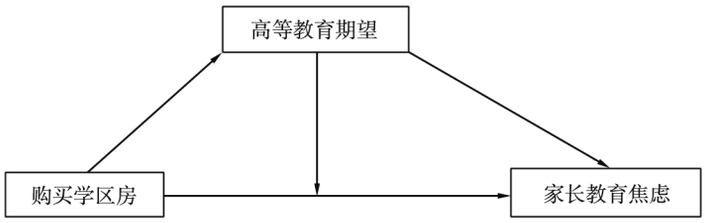


图1　购买学区房、高等教育期望与家长教育焦虑的关系模型

介效应分析解决，即因果中介分析[①]。VanderWeele提出了交互作用和中介作用的统一，将总效应分解出四个部分[②]。本文运用“四向效应分解”方法（four-way effect decomposition）进行分析，将总效应分解为四个部分：（1）既不是中介作用也不是交互作用，即受控直接效应（controlled direct effect）；（2）只是交互作用，但不是中介作用，即参照交互效应（reference interaction）；（3）既是中介也是交互作用，即中介交互效应（mediated interaction）；（4）只是中介作用，但不是交互作用，即纯间接效应（pure indirect effect）。因此，该方法可以同时分析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满足对于本文假设3的检验。

三、分析结果

（一）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

如表2所示，模型1至模型3为嵌套模型，因变量皆为家长教育焦虑，模型1仅包含控制变量和核心自变量购买学区房，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高等教育期望变量，模型3加入了购买学区房与高等教育期望的交互项。模型1结果显示，购买学区房会显著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使得家长的教育焦虑得分增加0.129分（$p<0.05$）。可见，购买学区房依然是家长教育焦虑的来源之一，假设1得到了验证。

模型2结果显示，在控制高等教育期望后，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系数为0.118，作用力略有下降，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没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家长相比，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家长的教育焦虑得分高0.218分，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期望与家长的教育焦虑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假设2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说明，购买学区房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部分影响可能是通过高等教育期望产生的，高等教育期望可能发挥着中介效应。

另外，城市、家长的年龄、子女数量、子女成绩和教育参与度都是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因素。根据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沈阳市的家长的教育焦虑程度显著低于东莞市的家长，但是其他城市的家长在教育焦虑程度方面与东莞市家长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焦虑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子女数量对于家长的教育焦虑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换言之，子女越多的家长，其教育焦虑感知越强。子女的成绩越是接近上游水平，家长的教育焦虑程度越低，子女成绩与家长教育焦虑呈负相关。但是，教育参与度与家长的教育焦虑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对子女教育参与度越高的家长，其教育焦虑会越强烈。

---

①Discacciati A., Bellavia A., Lee J. J., et al., Med4way: a stata command to investigate mediating and interactive mechanisms using the four-way effect decompos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 48, No. 1, 2019, pp. 15-20.

②VanderWeele T. J., A unification of mediation and interaction: a 4-way decomposition, *Epidemiology*, Vol. 25, No. 5, 2014, pp. 749-761.

(二)购买学区房与家长的教育期望

模型4以高等教育期望作为因变量,进行了logistic建模。结果显示,购买过学区房的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发生比是未购买学区房家长的1.597倍,且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购买学区房对于家长的高等教育期望可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购买了学区房的家长可能会对子女表现出更高的教育期望。结合模型2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高等教育期望可能会在购买学区房与家长的教育焦虑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

从城市方面来看,济南市家长和西安市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比东莞市家长高出72%和64.9%;在户口类型方面,非农业户口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是农业户口家长的1.382倍;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降低23.1%(=1-0.769);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越大;与产业工人职业的家长相比,从事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的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高出49.9%;子女成绩每提高一个等级,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将提高45.4%;子女教育参与度每增加1分,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可能性将提高0.9%。

(三)教育期望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模型3结果显示,购买学区房与高等教育期望的交互项系数为0.342(P<0.05),说明高等教育期望显著调节了购买学区房与家长教育焦虑的关系。图2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示出高等教育期望的调节效应,带圆点标记的虚线对应模型2的结果,带正方形标记实线和带三角形标记实线对应模型3的结果,即加入了购买学区房与高等教育期望的交互项。对比三条线的结果可知,有无高等教育期望对于购买学区房的家长而言,对教育焦虑的作用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有高等教育期望加剧了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正效应,而无高等教育期望改变了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方向,能够明显降低购买学区房家长的教育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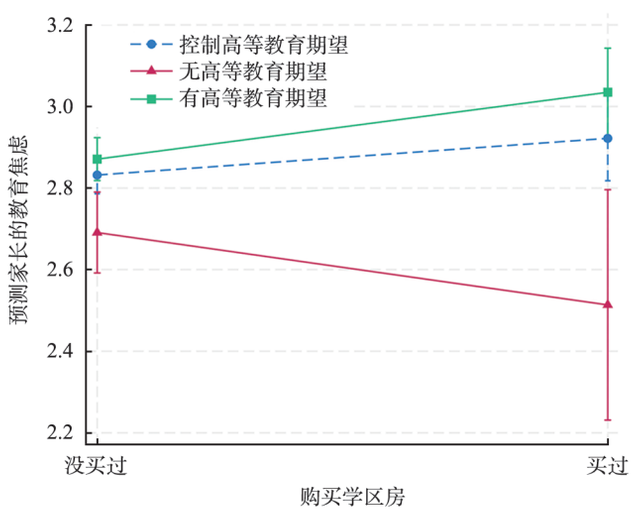


图2　购买学区房与高等教育期望对家长教育焦虑的预测结果

表2四向分解结果将总效应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以期更精准地解释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机制,特别是高等教育期望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结果显示,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总效应是正向显著的,即购买过学区房的家长,其教育焦虑程度平均比未购买过学区房的家长高0.133分,说明购买学区房总体上增加了教育焦虑。考虑到我国的家长普遍表现出高等教育期望的现实,以及购买学区房的家长普遍存在高教育期望的特征,在四向分解的模型中,将中介变量设定在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的水平之上(m=1),即以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为条件进行计算。首先,受控直接效应结果表明,当家长有高等教育期望时,购买学区房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直

表2　因果中介四向分解模型（N=2254）

变量	家长教育焦虑			高等教育期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odds ratio
	[S. E.]	[S. E.]	[S. E.]	[S. E.]
购买学区房	0. 129**	0. 118**	−0. 177	1. 597***
	[0. 057]	[0. 057]	[0. 152]	[0. 283]
高等教育期望		0. 218***	0. 180***	
		[0. 055]	[0. 058]	
购买学区房*高等教育期望			0. 342**	
			[0. 163]	
城市（参照组：东莞市）				
沈阳市	−0. 175*	−0. 179**	−0. 179**	1. 018
	[0. 091]	[0. 091]	[0. 091]	[0. 226]
济南市	−0. 078	−0. 097	−0. 089	1. 720**
	[0. 084]	[0. 084]	[0. 084]	[0. 389]
西安市	0. 065	0. 046	0. 050	1. 649**
	[0. 083]	[0. 083]	[0. 083]	[0. 342]
年龄	−0. 009***	−0. 009***	−0. 009***	0. 999
	[0. 003]	[0. 003]	[0. 003]	[0. 007]
非农户口	0. 053	0. 044	0. 036	1. 382**
	[0. 049]	[0. 049]	[0. 049]	[0. 181]
子女数量	0. 072*	0. 083**	0. 084**	0. 769***
	[0. 039]	[0. 039]	[0. 039]	[0. 077]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中专/技校	−0. 029	−0. 046	−0. 047	1. 388**
	[0. 062]	[0. 062]	[0. 061]	[0. 198]
大学专科	−0. 096	−0. 127*	−0. 128*	2. 293***
	[0. 073]	[0. 074]	[0. 073]	[0. 461]
大学本科及以上	−0. 094	−0. 127	−0. 127	2. 986***
	[0. 077]	[0. 077]	[0. 077]	[0. 660]
职业类别（参照组：产业工人）				
专业技术人员	0. 006	−0. 006	−0. 006	1. 499*
	[0. 077]	[0. 077]	[0. 077]	[0. 321]
子女成绩	−0. 144***	−0. 154***	−0. 155***	1. 454***
	[0. 030]	[0. 030]	[0. 030]	[0. 123]
子女教育参与度	0. 006***	0. 006***	0. 006***	1. 009***
	[0. 001]	[0. 001]	[0. 001]	[0. 002]
常数项	3. 413***	3. 342***	3. 365***	0. 191**
	[0. 303]	[0. 303]	[0. 303]	[0. 147]
R-squared/Pseudo R-squared	0. 062	0. 069	0. 071	0. 151

四向分解（Four-way Decomposition）	Coefficient	[S. E.]	95% 置信区间
总效应（total effect）	0. 133**	[0. 057]	（0. 021, 0. 245）
受控直接效应（controlled direct effect）	0. 164***	[0. 061]	（0. 045, 0. 283）
纯间接效应（pure indirect effect）	0. 011**	[0. 005]	（0. 001, 0. 020）
参照交互效应（reference interaction）	−0. 062**	[0. 029]	（−0. 119, -0. 004）
中介交互效应（mediated interaction）	0. 020*	[0. 012]	（−0. 003, 0. 043）

*** p<0.01，** p<0.05，* p<0.1。受版面限制，表格中未呈现出性别、部分城市（南京市、郑州市、青岛市）、户籍登记地、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单位类型、部分职业类别（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无业、不便分类及其他）、家庭年收入的对数的回归结果。

接效应系数为0.16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购买学区房会直接增加家长的教育焦虑。这部分效应与高等教育期望无关,原因可能是购买昂贵的学区房本身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焦虑,也可能是对子女现阶段学业表现不满带来的焦虑等。其次,纯间接效应是通过高等教育期望的中介效应,不涉及交互效应,即购买学区房通过高等教育期望进而增加家长教育焦虑0.011分,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购买学区房这一行为可能会提高家长的高等教育期望,高教育期望又会显著增加家长的教育焦虑。再次,参照交互效应结果说明,"购买学区房"和"无高等教育期望(m=0)"之间存在负向交互作用,两者同时存在时,反而会抑制焦虑水平的上升。当家长没有高等教育期望时,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减少0.062分,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购买学区房可能会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但是仅在家长没有高等教育期望的情况下成立。最后,中介交互效应是既通过中介变量,又涉及交互作用的效应。购买学区房的行为提升了家长的高等教育期望,而这份被提升的期望又与"购买了学区房"这个事实相互作用,共同将教育焦虑推高了0.020分,说明学区房与高等教育期望的协同作用使家长的教育焦虑额外增加。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期望在购买学区房与家长教育焦虑之间既存在调节效应,也存在中介效应,同时还存在一定的中介交互效应,假设3得到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家庭教育焦虑的产生、传递和传播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闭环,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主体[①],家长的教育焦虑成为了"双减"政策实施后的重要议题。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本文运用2023年特大城市调查数据,分析了政策实施后学区房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

首先,购买学区房依然是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因素。虽然受数据限制,本文无法对比"双减"政策实施前后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变化,但是分析结果说明,购买学区房不仅是影响家长高等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而且依然对家长教育焦虑程度发挥显著作用。购买了学区房的家长在教育焦虑方面显著高于未购买学区房的家长,这一结论说明,即使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学区房"依然是导致家长教育焦虑的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点。

其次,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其教育焦虑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有高等教育期望的家长,其教育焦虑的程度更高。这一结论再次验证了教育期望的重要性,我国特大城市的家长无论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如何,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非常一致的高等教育期望,这一结论同时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是由于希望子女至少获得高等教育水平而产生的,换言之,集中表现为高等教育焦虑。

再次,高等教育期望在购买学区房与家长教育焦虑之间既发挥着中介效应,也发挥着调节效应。一方面,购买了学区房的家长,表现出了更显著的高等教育期望,高等教育期望又进一步增强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即中介效应显著。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期望会调节购买学区房对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当家长无高等教育期望时,购买学区房能够明显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发挥负向调节效应;但当"购买学区房"与"高等教育期望"叠加时便会产生协同压力,从而导致焦虑水平出现额外的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说明了购买学区房对于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发挥着直接影响,还证实了"购买学区房—提高教育期望—加剧教育焦虑"的间接路径存在,厘清了高等教育期望的调节

①Liu T.,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al anxiety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7, No. 6, 2023, pp. 841-845.

效应以及“学区房与高等教育期望的交互压力”这四种不同路径的机制。

最后,“学区房热”虽然在双减政策后有所降温,但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并未减退。越焦虑的家长就越倾向于选择增加教育投入来缓解自身的焦虑,结果却是家长的教育焦虑非但没有得到缓解,还导致教育实践进入期望偏差—教育焦虑—教育投入—收益偏差的循环[①]。作为典型的家庭教育投入,购置学区房可能会成为这个恶性循环中的关键环节。虽然父母通过购置优质学区房可使子女间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但对子女的积极效果有限,无需夸大优质学区房的教育投资效用[②]。本文的结果说明,购买学区房如同给家长戴上了“焦虑放大镜”,不仅会提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会与高等教育期望一起协同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因此,家长需要警惕学区房的隐性成本,它不仅会因增加经济负担而产生直接的焦虑感,更会改变家长对教育期望以及教育焦虑的心理反应机制。由此可见,除了“学区房降温”的相应政策外,应当引导家长对学区房效应形成正确的认识,警惕学区房带来的直接经济压力,降低家长对高等教育的盲目期望,减少教育期望偏差,才能够真正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

此外,本文的结果并未呈现出不同阶层家长在教育焦虑方面的差异性,这可能是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特大城市,而家长教育焦虑在特大城市可能更为普遍。但是,不同城市的家长在教育焦虑方面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这可能是由于各城市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改革进程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城市的相关政策调整应当更加因地制宜,才可能有助于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本文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数据对学区房、高等教育期望和家长教育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但受到数据的局限,并没有将更多的变量纳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效度。下一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不同城市的差异性,增加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厘清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路径,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责任编辑:王文娟]

①苏慧丽:《数字时代的绩效博弈:教育焦虑与内卷的底层逻辑》,《中国电化教育》,2023年第6期。

②曹谦:《学区房真的重要吗?——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2015)数据的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年第6期。